

# 人口流动过程中离婚风险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任远 郝立

**【摘要】**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不同类型人口流动和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离婚风险的差异,探索人口流动影响离婚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近距离的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更高;婚前流动的离婚风险低于婚后流动;父母的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有负向影响。流动过程中的家庭分离会增加离婚风险;流动过程中经济资源的增加会降低离婚风险;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及与当地社会发生更多的交往和互动,使流动者更深地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扩大婚姻市场的替代性,增加离婚风险。血缘和同乡的社会交往网络具有传统规范约束的作用会降低离婚的风险。

**【关键词】**人口流动 离婚 差异 影响机制

**【作者】**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郝立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婚姻家庭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等现象。人口迁移流动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也对迁移者的婚姻家庭产生影响。在这个“流迁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迁移和离婚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农村居民,但低于城镇居民。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人口流动的过程影响婚姻的质量,增加婚姻市场中的替代机会,降低离婚的阻力,进而提高离婚的风险(马忠东、石智雷,2017;李卫东,2019)。实际上,迁移对离婚的影响是多样性的。在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过程中,如果农村地区离婚率较低,城市地区离婚率较高,那么迁移者的离婚率就可能会提高;同样,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往往也会提高离婚率(石智雷,2020)。但如果在离婚率相近的地区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和福利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ARK002)的阶段性成果。

间迁移,迁移者的离婚率未必会明显提高。或者说,有些类型的迁移可能会增加离婚风险,有些类型的迁移可能会降低离婚风险;有些人口群体在迁移中的离婚率会提高,有的人口群体的离婚率却可能降低。不同迁移类型及不同迁移流动群体的婚姻变动往往呈现不同的特点。

## 一、文献综述

迁移流动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及家庭中个体的发展,尤其对处于青年时期的流动人口的婚姻与家庭形成和婚姻解体具有影响(任远,2020)。迁移过程中流动者离婚行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 (一) 对迁移与离婚关系的不同看法

多数研究提出,迁移降低了婚姻的稳定性,提高了迁移者的离婚风险。迁出人口的离婚率被认为高于未迁移人口(Boyle等,2008),迁入人口的离婚率往往高于本地人口(González-Ferrer等,2016)。Milewski等(2014)研究发现,迁移者的离婚率比本地人口低,但迁移者和本地人结婚的离婚率高于本地人口。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外出就业和离婚概率提高是一个明显的现象,流动人口的婚姻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农村中流出群体比未流出群体具有更高的离婚率(李卫东,2017)。

一些研究从婚姻的角度分析迁移流动对婚姻解体的影响。一是迁移扩大了流动者的婚姻市场范围,提高迁移者遇见潜在伴侣或者替代对象的概率。城市拥有更大的再婚市场,婚姻搜寻成本下降会导致移民婚姻解体的增加(Lehrer,1996)。二是迁移影响移民婚姻质量,并增加离婚风险。迁移往往带来压力,增加焦虑和冲突,引发家庭内部矛盾和婚姻解体(Boyle等,2006)。迁移中的家庭分离是造成家庭内部压力和婚姻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个体单独流动造成夫妻分居,导致家庭功能缺失,降低婚姻质量,增加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吴存玉,2020)。因此,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排斥夫妻共同迁移,是导致人口流动过程中婚姻解体的制度性因素(张玉林,2012)。三是迁移削弱个体对婚姻的承诺,并提高离婚风险。人口流动使个体从村庄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来自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和婚姻承诺会有所弱化(罗小峰,2020)。在迁移过程中,个体独立性增加,城市中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迁移者的婚姻观。现代婚恋文化注重男女平等和追求个人幸福,使人们对离婚的容忍度提高,更加容易导致婚姻解体(刘成斌等,2016)。

对迁移和离婚关系的另一种看法认为,迁移流动并不一定降低婚姻的稳定性。例如,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下,丈夫外出务工挣钱,留守妇女承担农业生产与家庭照料,这样的性别分工被认为有利于婚姻的维系(金一虹,2009)。Agadjanian等(2017)提出有两种迁移,一种是成功的迁移,表现在迁移过程中收入增长和家庭汇款,

另一种是失败的迁移,流动后的家庭收益没有得到改善。成功的迁移可能会增强婚姻的稳定性,而失败的迁移则可能导致婚姻破裂。

## (二) 不同迁移类型对离婚影响的差异

迁移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家庭安排对离婚风险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莫玮俏、史晋川(2015)研究发现,无论夫妻是单独流动还是共同流动都会提高离婚概率。但与夫妻一方单独流动相比,夫妻共同流动的离婚风险较低。流动距离会影响离婚行为。流动距离越短,流动者与当地的文化差异越小,社会交往增多,婚姻搜寻成本降低,提高离婚风险(马忠东、石智雷,2017)。李卫东(2019)则发现,与近距离流动相比,跨省流动会降低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此外,迁移时间、父辈是否是移民、迁移频率、乡城迁移还是城城迁移等因素对婚姻稳定性也会产生不同影响。Frank等(2005)研究发现,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越长,离婚风险越高。移民和移民后代的离婚风险略高于本国人口(Nekby,2012)。与没有迁移或迁移一次的夫妻相比,迁移频率越高,婚姻解体的风险越高(Muszynska等,2007)。Boyle等(2008)研究发现,夫妻的第一次迁移对离婚倾向没有影响,但当迁移两次及以上,无论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迁移,均会增加离婚风险。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人口婚姻解体的风险比农村居民高,比城市居民低,从城市到农村的迁移人口婚姻解体风险最低(莫玮俏、史晋川,2015)。

## (三) 迁移对离婚影响的群体差异

迁移对离婚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较大差异。迁移提高离婚率对女性迁移者更加明显。基于婚姻内部交换理论的视角,迁移后夫妻双方经济力量发生变化,带来家庭内部权力关系或性别分工的变化,会增加夫妻间关系的紧张,造成婚姻不稳定(Darvishpour,2002)。Hirsch(2003)研究发现,一些墨西哥妇女迁移到美国后,从家乡的性别规范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自由,婚姻更容易不稳定。关于中国国内迁移对离婚行为影响的研究也表明存在性别差异,单身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有显著负面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影响不显著(李卫东,2019)。

迁移对离婚的影响还存在年龄、代际、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从代际看,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彭大松、刘越,2019;李卫东,2019)。流动人口离婚率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马忠东、石智雷,2017)。一些国际迁移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外国妻子比受教育程度高的外国妻子离婚概率更高(Choi等,2020)。但另一些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移民自主选择能力较强,从而离婚率会上升(Kalmijn等,2004)。

综上所述,迁移究竟会降低还是提高离婚风险,已有研究没有明确、一致的结论,不同的迁移对离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而这些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离婚风险也不确定。在关于迁移对离婚影响的研究中,一些分析的落脚点是论述迁移过程对婚姻市场、婚

姻质量和婚姻承诺所带来的影响,从而解释迁移过程中离婚风险的上升。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迁移会提高离婚率,因此不能充分理解迁移过程的复杂性对离婚的差异性影响。例如,马忠东、石智雷(2017)研究发现,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具有更高的离婚概率,因为在较近距离的流动中,文化一致性有利于增加婚姻选择的搜寻机会;而李卫东(2019)研究发现,远距离的人口流动具有更高的离婚概率,由于远距离流动减少了婚姻的约束力,从而增加离婚行为。这些研究往往预设结论,主观性地解释迁移为什么增加了离婚风险,不利于充分理解迁移影响婚姻行为的具体过程和作用机制。因此,与“从婚姻的角度”解释迁移如何影响离婚相比,更可靠的方法是回到迁移本身,从迁移的角度探讨迁移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对婚姻关系和婚姻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分析不同的人口流动过程对离婚风险的影响,探索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主要涉及以下3个问题:(1)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影响表现出怎样的差异?(2)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发生离婚的风险表现出怎样的差异?(3)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变化,如何对离婚行为产生影响?

##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迁移者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不同的变化,使人口流动对离婚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 (一)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家庭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人口流动构成生命历程中的冲击事件,影响家庭和婚姻。流动过程中不同家庭安排对婚姻会产生不同影响。人口流动过程中主要有两种家庭安排,一种是家庭分离,另一种是家庭化的迁居。家庭分离会减少夫妻间的沟通,弱化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降低婚姻满意度,使婚姻约束弱化,提高离婚风险。相反,家庭化迁居有助于维持婚姻的沟通和婚姻质量,特别是有子女家庭的共同流动,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完整性,从而减少婚姻解体。因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家庭安排假设:家庭分离的流动比家庭化迁居离婚风险更高(假设1)。

### (二)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贝克尔(Becker, 1973)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家庭内部的交换关系,夫妻双方会基于实现资源交换和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婚姻行为决策。婚姻关系的长久维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各自持有特定资本的交换,可以交换的婚姻资本越多,婚姻的稳定性越高(Becker等, 1977)。流动人口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资源,改善家庭福利,因此,当其在城市收入增加并给家庭汇款,可以缓解留守群体生存压力,对婚姻稳定具有积极作用(Ono, 1998)。如果迁移能够增进家庭收入和经济资源,改善家庭生活,那么迁移可能会降低婚姻的解体。基于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经济资源假设:流动过程中人口经



济资源的增加会降低其离婚风险(假设2)。

### (三)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在迁移过程中,迁移者与当地社会发生紧密联系和逐步实现社会融合。他们逐步实现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和同化,日益接受城市生活观念及主流文化(王春光,2001)。在城市中个人自由和多元开放的价值观影响下,社会融入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婚恋观逐渐和城市居民趋同。因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社会融入假设: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其离婚风险越高(假设3)。

迁移流动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还表现在迁移者通过社会交往构造社会网络,并重构当地的社会结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资本影响迁移,特别是在迁移的早期,这类社会资本对迁移者的就业和生活具有积极作用(Portes等,1993)。流动人口与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同乡群体交往越密切,受流出地社会规范的影响越强,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使流动人口婚姻解体的风险越小;相反,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交网络的扩大及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的频繁,会带来婚姻市场的扩大,对其婚姻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社会交往假设:(1)流动人口与同乡更多的社会交往会降低其离婚风险(假设4)。(2)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社会交往更多会增加其离婚风险(假设5)。

##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基于人口规模比例抽样的PPS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随机抽取样本。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16~59周岁的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根据研究需要,删除未婚、再婚、丧偶、同居的流动人口,以及20岁以下的女性人口和22岁以下的男性人口。为了避免迁移和婚姻关系的选择性,删除迁移目的为结婚及存在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19506人。

### (二) 变量说明

“是否离婚”是本研究的因变量,用其衡量流动人口的婚姻解体,将“在婚”赋值为0,“离婚”赋值为1。关于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本文主要考虑流动种类、流动距离、流动时长、流动时间类型、父母流动经历等变量。由于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流动数量极少,本文将“流动种类”分为“乡乡流动”“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三类。如果调查者是“农业户口,乡村居住”定义为“乡乡流动”;“农业户口,城市居住”定义为“乡城流动”;“非农户口、城市居住”定义为“城城流动”。“流动距离”分为“市内跨县流动”“省内跨市流动”

“跨省流动”三类。“流动时长”是调查年份(2017年)和受访者首次流动年份的差值。“流动时间类型”包括“婚前流动”和“婚后流动”两类,如果受访者首次流动年份早于初婚时间,定义为“婚前流动”;反之,定义为“婚后流动”。“父母流动经历”分为受访者父母“有过流动经历”和“没有过流动经历”两类。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体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受访者的子女数量。其中,“民族”变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类。“健康状况”是受访者的自评健康,分为“不健康与生活不能自理”“基本健康”和“健康”三类。

四、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差异性影响

(一) 不同类型人口流动离婚状况的描述分析

表1给出了不同类型人口流动的离婚状况。在受访的曾经结婚的流动人口中,目前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为2.25%,总体来看,流动人口的婚姻较为稳定。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离婚比例为2.01%,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的离婚比例为3.88%。从不同流动距离看,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比例为2.01%,低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2.40%)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2.65%)。从流动时长看,流动时间小于5年的流动人口中离婚比例为3.15%,流动时间为5~10年的离婚比例为1.96%,流动10年以上的离婚比例为2.09%。在流动人口中,婚前流动数量高于婚后流动数量,婚前流动人口中的离婚比例为1.66%,低于婚后流动者。12.12%的流动人口的父母有流动经历。父母有流动经历的离婚比例为1.78%,低于父母没有过流动经历的人口(2.31%)。

表 1 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在婚和离婚比例

变 量	频次	占比(%)	离婚		在婚
			频次	占比(%)	占比(%)
婚姻状况					
在婚	116818	97.75	—	—	—
离婚	2688	2.25	—	—	—
流动种类					
乡乡流动	30991	25.93	599	1.93	98.07
乡城流动	73220	61.27	1496	2.04	97.96
城城流动	15295	12.80	593	3.88	96.12
流动距离					
市内跨县流动	20894	17.48	553	2.65	97.35
省内跨市流动	38590	32.29	926	2.40	97.60
跨省流动	60022	50.23	1209	2.01	97.99
流动时长					
小于5年	21260	17.79	669	3.15	96.85
5~10年	28881	24.17	567	1.96	98.04
10年以上	69365	58.04	1452	2.09	97.91
流动时间类型					
婚前流动	59853	50.08	993	1.66	98.34
婚后流动	59653	49.92	1695	2.84	97.16
父母流动经历					
有	14486	12.12	258	1.78	98.22
无	105020	87.88	2430	2.31	97.69

(二) 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2模型1至模型5将不同流动类型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模型6将所有变量都纳入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以看出,婚前流动的离婚风险低于婚后流动。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长较短时,离婚风险较高,父母有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父母没有流动经历的人口相比,父母有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更高。从流动种类看,城城流动的离婚风险更高。从流动距离看,近距离的市内跨县流动的离婚风险更高,远距离的跨省流动对离婚的影响显著降低。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反映出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离婚状况存在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更强。分年龄的人口流动离婚概率先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然后出现转折并逐步减小。虽然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概率会下降,但从文盲到高中阶段,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概率是提高的,而接受过大学和更高教育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会明显降低。同时,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好,其离婚风险越低。流动人口的子女数量越多,其离婚成本更高,具有更低的离婚风险。

五、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主要从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探讨流动过程对婚姻解体的影响机制。由于本文利用截面数据不能区分离婚事件和流动的先后顺序,不能对迁移流动与离婚风险开展充分的因果关系验证,仅通过回归分析解释迁移过程流动人口婚姻变动的影响。

(一) 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为了验证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家庭安排假设(假设1),本文按照有无子女将家庭分为“夫妻二人户家庭”和“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两类,然后分别分析人口流动中不同的家庭安排对离婚的影响。从表3模型7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夫妻二人户家庭来说,相对于夫妻共同流动的家庭安排,家庭中无论谁单独流动均会显著提高离婚风险。“妻子流动丈夫留守”比“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离婚概率更高。从模型8的结果可以看出,核心家庭所有成员共同流动的离婚概率最低。在各种家庭分离中,仍是“妻子流动,丈夫带子女留守”的离婚概率最高,其次是“丈夫流动,妻子带子女留守”。“夫妻流动,子女留守”的离婚概率和家庭所有成员共同流动的家庭没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折射出家庭分离提高离婚风险主要是通过夫妻分离发生影响。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分离会显著增加婚姻解体的风险,尤其以女性流动的家庭分离更为突出。

(二)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为了衡量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资源,本文选取迁移过程中家庭经济收入和人口流

表 2 不同类型人口流动对离婚影响的 Logit 回归(N=119506)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流动时间类型(婚后流动)						
婚前流动	-0.0887* (-0.048)					0.0620 (-0.062)
流动时长		-0.0428*** (-0.007)				-0.0425*** (-0.007)
流动时长的平方		0.0010*** (0.000)				0.0010*** (0.000)
父母流动经历			0.1910*** (-0.070)			0.2328*** (-0.070)
流动种类(乡乡流动)						
乡城流动				-0.0210 (-0.052)		-0.0230 (-0.052)
城城流动				0.4851*** (-0.069)		0.4634*** (-0.070)
流动距离(市内跨县流动)						
省内跨市流动					-0.1932*** (-0.058)	-0.1904*** (-0.058)
跨省流动					-0.3330*** (-0.061)	-0.3153*** (-0.061)
男性	-0.2817*** (-0.041)	-0.2739*** (-0.041)	-0.2968*** (-0.040)	-0.2757*** (-0.040)	-0.2893*** (-0.040)	-0.2593*** (-0.041)
年龄	0.2992*** (-0.017)	0.3244*** (-0.017)	0.3106*** (-0.017)	0.3005*** (-0.017)	0.3043*** (-0.017)	0.3349*** (-0.018)
年龄的平方	-0.0029*** (0.000)	-0.0032*** (0.000)	-0.0030*** (0.000)	-0.0029*** (0.000)	-0.0029*** (0.000)	-0.0033*** (0.000)
汉族	-0.3795*** (-0.066)	-0.3746*** (-0.066)	-0.3839*** (-0.066)	-0.3691*** (-0.066)	-0.3259*** (-0.068)	-0.3168*** (-0.068)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458*** (-0.054)	0.1405** (-0.054)	0.1424** (-0.054)	0.0900 (-0.055)	0.1375** (-0.054)	0.0808* (-0.055)
高中	0.1731*** (-0.066)	0.1638** (-0.066)	0.1659** (-0.065)	0.015 (-0.069)	0.1526** (-0.066)	-0.0010 (-0.069)
大专及以上	-0.3580*** (-0.087)	-0.3730*** (-0.086)	-0.3726*** (-0.086)	-0.6651*** (-0.094)	-0.3945*** (-0.087)	-0.6744*** (-0.094)
健康状况	-0.1075*** (-0.040)	-0.1232*** (-0.040)	-0.1045*** (-0.039)	-0.1072*** (-0.040)	-0.0990** (-0.039)	-0.1193*** (-0.040)
子女数量	-1.0614*** (-0.034)	-1.0397*** (-0.034)	-1.0608*** (-0.034)	-1.0317*** (-0.034)	-1.0581*** (-0.034)	-1.0093*** (-0.034)
截距项	-8.9403*** (-0.400)	-9.1826*** (-0.390)	-9.3007*** (-0.397)	-8.9972*** (-0.390)	-8.8594*** (-0.393)	-9.1917*** (-0.423)
伪 R <sup>2</sup>	0.098	0.100	0.098	0.101	0.099	0.104
chi2	2527.696	2566.973	2531.429	2600.972	2553.547	2676.215

注：括号内变量为参照组；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p<0.1，\*\*p<0.05，\*\*\*p<0.01。



表 3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家庭安排对离婚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7	模型 8
夫妻二人户家庭安排(夫妻共同流动)		
丈夫流动妻子留守	4.6711***(-0.627)	
妻子流动丈夫留守	5.2878***(-0.875)	
有子女的核心家庭安排(核心家庭共同流动)		
夫妻流动,子女留守		0.1593(-0.216)
丈夫流动,妻子带子女留守		3.5969***(-0.226)
妻子流动,丈夫带子女留守		3.7096***(-0.189)
截距项	-30.6584(-931.034)	-10.2672***(-0.796)
伪 R <sup>2</sup>	0.5352	0.2490
chi2	538.3284	2090.9834
观测值	1482	41269

注:括号内变量为参照组;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p<0.1,\*\*p<0.05,\*\*\*p<0.01。

表 4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经济资源对离婚的影响(N=88014)

变 量	模型 9	模型 10
家庭经济收入	-0.4131***(-0.017)	-0.4659***(-0.021)
自购(自建)住房	-0.4925***(-0.060)	-0.6181***(-0.064)
截距项	-0.2154(-0.148)	-5.4985***(-0.507)
伪 R <sup>2</sup>	0.0278	0.1189
chi2	479.6943	2054.9365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模型 9 未控制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模型 10 控制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p<0.1,\*\*p<0.05,\*\*\*p<0.01。

动过程中是否在流入地有自购房或自建住房两个指标,试图基于迁移者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比较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影响(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流动过程中具有更高经济收入的人口,包括具有更高家庭经济收入及拥有自购自建住房增加,均会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在加入控

制变量与省份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假设 2 得到验证。

(三)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变化和离婚风险

本文选择“落户意愿”反映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程度,表 5 模型 11 中仅加入落户意愿主效应,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与离婚风险正相关,落户意愿强烈,离婚风险会显著增加。考虑到中国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是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且这两类群体的落户意愿存在差异,因此模型 12 中加入流动种类作为调节项并进行比较。从交互项看,有落户意愿的乡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会增加,有落户意愿的城城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则不显著。这说明乡城流动人口如果更能融入当地社会,会增加其离婚概率。假设 3 得到验证,即流动人口通过融入当地社会增强其现代性,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会带来更高的离婚风险。

表 5 模型 13 是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情况,本文将问卷中“与本地人

交往”和“参与志愿者活动”合并为“本地交往指数”。回归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和流入地本地人口的社会交往会显著提高离婚概率,说明存在“婚姻市场扩大的影响”。模型 14 表明,流动人口与同乡交往能够显著降低其离婚风险,反映出存在同乡之间的“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影响”。本文将两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 15,结果表明二者的影响依然稳健。假设 4、假设 5 得到验证。

表 5 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融入与社会交往对离婚的影响(N=88014)

变 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落户意愿	0.402*** (0.052)	0.091 (0.107)			
乡城流动		-0.179** (0.079)			
乡城流动×落户意愿		0.457*** (0.126)			
城城流动		0.6207*** (0.129)			
城城流动×落户意愿		-0.002 (0.156)			
与流入地居民交往			0.077*** (0.023)		0.054** (0.024)
与同乡交往				-0.216*** (0.056)	-0.177*** (0.058)
截距项	-9.416*** (0.492)	-9.145*** (0.492)	-8.927*** (0.488)	-8.933*** (0.488)	-8.897*** (0.488)
伪 R <sup>2</sup>	0.095	0.099	0.092	0.092	0.092
chi2	1633.852	1709.58	1585.061	1589.322	1594.303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控制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p<0.1, \*\*p<0.05, \*\*\*p<0.01。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类型人口流动对离婚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城流动的离婚风险高于乡城流动;近距离的市内跨县流动的离婚风险更高;婚前流动的离婚风险低于婚后流动;父母曾经的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有负向影响。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离婚风险存在差异;女性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更高;随着流动人口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离婚风险下降。

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分离会增加离婚风险;流动过程中具有较低经济资源的“失败的迁移”比经济资源较高的“成功的迁移”离婚风险更高;同时,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发生社会生活的变化,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及与当地社会发生更丰富的交往和互动,使流动者更深地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同时扩大了婚姻市场的替代性,从而提高离婚风险,而血缘和同乡的社会交往网络具有传统规范约束的效果,会降低离婚风险。

在迁移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生活会发生变化,从而增加离婚风险。这在一方面折射出迁移过程对迁移者产生压力和困难。迁移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事件对个人生命历程形成

冲击,而生活中的冲击往往不利于婚姻稳定。在迁移带来的人生变化过程中,迁移者面临着若干制度和结构的壁垒,会对其生活形成限制和制约,进而造成婚姻解体。例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带来家庭分离会增加离婚风险;或者当迁移者经济收入难以有效提高,对迁移者劳动就业和住房购买的限制会阻碍其经济资源的获取,增加离婚风险;同时,由于制度的排斥、社会组织的缺乏和缺乏社会支持,阻碍了迁移者融入流入地社会,也会提高迁移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同时,并非所有迁移过程中的离婚都是“不好”的现象。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变化影响离婚,在另一方面反映出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的增长。随着个人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更多的自我选择和个体独立性,迁移者也有能力脱离传统社会规范的限制,这些都会扩大离婚风险。离婚有时是社会更加开放的结果,是个体现代性的提高和追求生活幸福的积极选择。

在迁移过程中的离婚具有“现代性”和“弱势性”双重属性和双重影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离婚受到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是个体现代性增长的表现,反映出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个人特别是女性挣脱父权社会的约束,甚至还成为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离婚也表明个体生活的不幸福,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反映出部分弱势群体受到制度的限制,难以对家庭福利和家庭发展提供保护,并带来婚姻质量的下降、造成婚姻解体。迁移对离婚影响的差异性告诉我们,迁移对婚姻的影响包含着社会变迁过程中“进步的力量”和“破坏的力量”的综合影响。因此,为了使迁移流动的过程能够更好支持人们的生活福利,需要支持迁移过程中的自由选择和个人成长,同时,需要帮助迁移者充分适应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性变化,更加重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避免迁移对于婚姻家庭的破坏作用。在这些方面仍要重视和有针对性地改善。

#### 参考文献:

1. 金一虹(2009):《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2. 李卫东(2017):《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代际、迁移和性别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3. 李卫东(2019):《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社会》,第6期。
4. 刘成斌、童芬燕(2016):《陪伴、爱情与家庭:青年农民工早婚现象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5. 罗小锋(2020):《婚姻承诺理论视角下农民工婚姻关系的维系》,《青年研究》,第2期。
6. 马忠东、石智雷(2017):《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7. 莫伟俏、史晋川(2015):《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8. 彭大松、刘越(2019):《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人口学刊》,第2期。
9. 任远(2020):《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社会科学》,第9期。
10. 石智雷(2020):《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社会》,第1期。
11.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12. 吴存玉(2020):《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婚姻脆弱性与留守家庭困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3. 张玉林(2012):《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 Agadjanian V., Hayford S.R., and Jansen N.A.(2017), Men's Labor Migration and Women's Health and Mortality in Rural Mozambique. 2017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IUSSP.
15. Andersson G., Obućina O., and Scott K.(2015), Marriage and Divorce of Immigrants and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 Sweden. *Demographic Research*. 33(1):31-64.
16. Becker G.S.(1973), 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4):813-846.
17. Becker G.S., Landes E. M., and Michael R.T.(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6):1141-1187.
18. Boyle P.J., Kulu H., Cooke T., Gayle V., and Mulder C.H.(2006), The Effect of Moving on Union Dissolutio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WP 2006-002)*.
19. Boyle P.J., Kulu H., Cooke T., Gayle V., and Mulder C.H.(2008), Moving and Union Dissolution. *Demography*. 45(1):209-222.
20. Choi Y., Kim D., and Ryu J.(2020), Marital Dissolution of Transnational Coupl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6(14):3014-3039.
21. Darvishpour M.(2002), Immigrant Women Challenge the Role of Men:How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hip within Iranian Families in Sweden Intensifies Family Conflicts aft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3(2):271-296.
22. Frank R., and Wildsmith E.(2005), The Grass Widows of Mexico:Migration and Union Dissolution in a Binational Context. *Social Forces*. 83(3):919-948.
23. Hirsch J.(2003), A Courtship after Marriage:Sexuality and Love in Mex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4. Kalmijn M., De Graaf P.M., and Poortman A.R.(2004),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ivorce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1):75-89.
25. Lehrer E.L.(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tabil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rst and Higher-order Marriages. *Research in Population Economics*. 8:91-121.
26. Muszynska M., and Kulu H.(2007), Migration and Union Dissolution in a Changing Socio-economic Context: The Case of Russia. *Demographic Research*. 17(27):803-820.
27. Nekby L.(2012),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Sweden.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Europe*. 172-209.
28. Ono H.(1998), Husbands' and Wives' Resource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74-689.
29. Portes A., and Zhou M.(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74-96.

(责任编辑:朱 犁)